

乡土文学的历史启示和现实选择

文坛观察
WENTANGUANCHA

王力平

乡土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镇。乡土文学的创作实践,是五四新文学“从天上落到地上”的努力,是让新文学、新文化的现代性思想理念,落实到中国社会的现实中。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现实,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是“乡土性的”。所以,乡土文学实质上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和视角,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审美发现。乡土文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留下了不同的历史启迪,重新认识这些审美特征,深入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乡土文学创作有着有益镜鉴。

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把乡土作为审视和批判、怀旧和惦念的对象,而作者是在乡土之外的。作家与乡土审美关系的“外视角”特征,决定了作家笔下的乡土是一种静态的、一种确定的情感样式和文化形态。比如鲁迅写阿Q的精神胜利,在《优胜记略》里,阿Q说:“我们先——比你阔的多啦!”到结尾的“大团圆”里,阿Q依然想着“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这个特点与新文学的启蒙性质相关,因此它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一部分作家从审视的、批判的立场去看乡村,看到了麻木、愚昧和冷漠,他们笔下的乡土文学因此具有了批判和启蒙的性质,如鲁迅的《阿Q正传》。另一批作家从怀旧的、惦念的立场去看乡村,看到了淳朴、善良和温暖,他们笔下的乡土文学洋溢着怀旧的温情和田园的浪漫,如沈从文的《边城》。不

同的作家与乡土之间建构了差异化的、不同向度的审美关系。笔者把这个特点概括为作家与乡土审美关系的“全向度”特征,它是五四时期多元化思潮相互激荡的必然结果。

从解放区文学中的乡土叙事开始,到围绕土改、合作化展开的文学创作,是乡土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作家看待乡土的视角发生了由外而内的变化。作者不再是站在乡土之外的观察者、评判者,乡土也不再是被审视、批判和怀旧、惦念的对象,而是成为历史发展和变革的主体。这种变化既表现在情节结构中,也表现在人物塑造上。例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土改工作队从进入暖水屯,到走进暖水屯农民心里,是一个生动的过程。伴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是张裕民、程仁、侯志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玉林、郭全海、老孙头(《暴风骤雨》)等一系列农民形象不断觉悟和成长的过程。当小说的叙述和描写不再是某种单一的生存状态或文化形态的呈现,而是深入到人物欲望和历史动机的内里,追寻着人物朝向自身目标的具体行动时,我们确定这是一种基于“内视角”的文学叙事。

但与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相比,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差异化的审美视角消失了,代之以前以同质的思维向度。于是,在“土改”叙事中,佃户长工无论与地主之间曾经发生过怎样的经济关系和情感关系,最终都将觉悟并站上揭露和控诉东家的舞台。同样,在“合作化”叙事中,虽然有人表现出犹豫不舍和抗拒,但这种犹豫不舍和抗拒总是被视为落后、守旧甚至是反动,很少去关心其中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显然,“单向度”审美视角下的文学叙事,有利于凸显新与旧、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的冲突对立,却无助于表现深邃复杂的现实关系、情感内涵和社会生活的历史具体性。

新时期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乡土文学创作是其发展的第三阶段。在新时期乡土文学创作中,一些与农村经济改革发生关联的作品,比如贾平凹《鸡窝洼的人家》、何士光《乡场上》,其审美焦点通常不是落在具体的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上,而是投向于人,人的尊严、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表现出审美对象的“复合化”特征。这一方面说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有调动经营者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限度、有边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纯地透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去观察和理解当代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难以产生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叙事。另一方面则折射出时代精神的嬗变。如果说围绕“合作化”展开的乡土叙事,曾深入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的曲折过程,充分发掘了集体主义的潜能和魅力,那么新时期乡土小说则更专注于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专注于人的情感历程和人性内涵的丰富性。比如路遥的《人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它们往往半是对乡土世界的反思,半是对个人青春的伤逝;半是对传统文化糟粕的批判,半是对生命意识的反思。总之,新时期文学中的乡土叙事已经不甘于仅仅是对乡土土无旁骛的凝视。当然,这种变化同时也表明,虽然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仍然是农业大国,但随着现代工业体系的初步建成,中国已不再是当年的乡土中国,关于乡土的文学叙事也必然出现新的变化。这一时期有分量的乡土叙事,往往不会把笔触局限于乡土,比如《平凡的世界》。在路遥笔下,乡土其实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乡村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动机,往往要在乡土之外、在更广大的世界中才能得到解释。而视野一旦被时代生活打开,即使是面对历史、面对前尘往事的乡土叙事,也会打上时代精神的烙印,作家的视点会超越于乡土之上,安

置在更高的地方,比如《白鹿原》。在陈忠实笔下,白鹿原的故事始终被一个更大的故事包裹着、牵动着,它是“塬”上的故事,又不仅仅属于“塬”上。

梳理这些历史启示,有三点值得今天的乡土文学创作思考。

首先,作家应努力构建置身乡土之中的“内视角”。在当代中国,乡土不是一个静态的、自在的、被审视的对象,作家不能满足于站在乡土之外,去冷静地审视它、愤怒地批判它,或者热烈地赞美它、深情地怀念它。构建置身乡土之中的“内视角”,意味着把乡土看作是自觉的、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具有自觉意志、动机和目的的历史实践活动的主体。他们是乡村变革的主人公,而不是消极等待被救助的贫困户。

第二,作家应努力构建“全向度”的审美和思维模式。面对当代社会农业工业化、乡村城镇化的现实,乡土文学创作必须超越“二元思维”模式。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有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同时春耕秋收又是农民的生活方式,土地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所以它无法计价。前者是历史理性,后者是人文情怀。今天的乡土叙事,有责任把它们统一起来,有责任完成“全向度”的观察、体验和描写。

第三,作家应努力把乡土置于具体的现实关系和普遍联系中,呈现一个“复合化”的乡土社会。今天的乡土文学不应逃避现实,不应淡化现实关系和普遍联系。这种普遍联系包括横向的、空间性的联系,比如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经济与文化,进城与返乡,联产承包与土地流转,环境污染与绿水青山等等。也包括纵向的、时间性的联系,比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只有把它放在自土地革命开始的艰苦卓绝的历史过程中,才能真正理解它,才能更真实、更准确地呈现当代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历史具体性。

书写平凡个体的情感与生命体验

——读邓安庆长篇小说《望花》

林 颀

《望花》(译林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是青年作家邓安庆的长篇新作,书名源自一个小镇的名字——望花镇,小镇有一家历史悠久的酒庄。中国有很多类似的小镇,围绕着核心产业发展起来,人们在那里聚集,世代繁衍生活。邓安庆到望花酒庄采访时,看着工人们擦拭、查看,再擦拭、查看,忍不住对接待他的赵娟说:“我没法想象自己会像这样重复一个动作这么多年,几乎说是一生的时间都耗在这儿。”而赵娟告诉他,她的爸爸妈妈在这里干了一辈子,爸爸负责烧锅炉,妈妈负责包装盒。

张云松和赵娟是这部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张云松22岁,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接手公司前辈唐浩撰写企业内刊《望花》。赵娟26岁,是酒庄的宣传人员。小说分为三部分,第一和第三部分采用张云松的视角,第二部分采用赵娟的视角。两人因工作接触,互生好感,可惜,这段感情无疾而终。

小说情节简单,那些秘而不宣的心事隐藏着年轻人的惘惘不知归处。两人感情初萌,源于开头的对话,他们彼此窥见了对方的想法,那一刻,心灵接近,互生同情。“一生”这个词,在小说中出现了好几次。赵娟说自己从小到大都在望花镇,“感觉一生都耗在这儿了”。张云松说:“怎么会一生呢?我们都很年轻啊。”赵娟笑了笑,没有言语。这段对话,写出了张云松阅世尚浅,而赵娟已经比他更深刻地察觉生活的无奈。

赵娟之所以抗拒同一小镇的温磊,抗拒岳母安排的相亲,原因正在于此。嫁给温磊,意味着安稳,也意味着一望而知的“一生”。张云松与赵娟,彼时彼此,无法成双。作为没有后盾的、完全靠自己拼搏的打工人,张云松连买一套像样的衣服都尚且不能,战战兢兢地唯恐失去这份工作。小说还描写了柳经理、唐浩、吴鹏等人的工作状况和生活选择。这些配角人物的经历,烘托了影响主角行为的那些心理因素,也揭示了群体普遍意义上的个体选择之困难。

普通人的行为,受生活环境、家庭条件等多方面影响,渗透着现实的需要。在此意义上,“望花”成为一种意象和象征,超越了情节本身的限制,超越了对生活的临摹式描写,呈现普通人生活的纠结、软弱和困惑,引发读者的共鸣。

“望花”是一张网,轻轻地笼罩着网中人,身处其内,你可以获取基本的保障,而“一生”可能就这样慢慢地过去。这张网密切连接着,经纬交错,盘根错节,构成一种无形的强大力量,逼迫着渺小个体的退缩到消弭自身需求的境地。这是张云松和赵娟的感情不能发展的原因。甚至连恋爱都算不上,只是一点点好感的流露,好事者就四处传播,把这点苗头扼杀在萌芽阶段。以城镇生活而言,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好比一个需要保持微妙平衡的网络,每个人的行动都会影响到他人,这张网会自发地以它的权威和智慧来防备所有可能的缺口,会把每个人固定在各自的位置。

对张云松、赵娟感情的描写,作者把握得很真实,这是一个动心、遗憾而别无选择的故事。在最后,只能是一句:“过望花街时,能不能开慢一点儿?”这段感情如同一场初雪,纯洁真挚,单薄脆弱,在落地之前,就已经消融在空气中。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下一场雪,而雪自己知道,它曾经来过……



展现传奇故事中的坚韧生命力

——蒋殊儿童文学新作《红星杨》赏析



崔昕平

在太行山深处的山西省武乡县生长着一棵奇特而挺拔的白杨树。白杨树的每一根树枝的横断面都有一颗五星,当地人称之为“红星杨”。据说,“红星杨”最早是朱德总司令在晋中时栽种的。山西作家蒋殊以此为蓝本,创作出颇具传奇韵味的儿童文学新作《红星杨》(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首次尝试儿童小说创作的蒋殊,以女性作家的细腻,以文学故乡不竭的创作资源与精神滋养,开创了一种独属于她的写法,在战争题材儿童小说中呈现出独特的个性化特征。

该书赋予红色题材书写另一重定

位。作品始终以一种民间的、平民的、孩童的视角,以“沉浸式”的方式描摹平民在残酷战争中的真实生活。孩子们从最初意外发现“五星杨”,到起意寻找其他藏在杨树林里的“五星杨”,路上保护小杨,再到突发奇想用红墨水描红了“五星杨”,满村扣上五角星的红章,都沉浸在一种孩童的游戏状态中。两位受伤的八路军战士来到村里,他们身上珍藏的那顶带有红五星的红军帽让村民们肃然起敬,而村中那一颗颗红墨水印出的红五星也让两位八路军战士对杨林村刮目相看。与众不同的“红五星”最终引来了疯狂的日寇。当日寇在村民面前挥舞起寒光闪闪的刺刀时,村民们没有胆怯,他们保护了受伤的八路军战士,更保卫了心中的信仰。作品中,有一个桥段设计得非常意味:大人们面对村庄印满了红五星的五角星,都保持平静,甚至装作视而不见。这里写得极为真实,透露出那个时代老百姓的诚挚情感。他们惊讶但却默默地,以一种保护的态度假装无视它的存在,内心却对它做出了神圣的解读,将它归结为冥冥之

中的天意。日寇以屠村、烧树的方式,力图摧毁人们心中的信仰与期盼。然而,当日寇试图用钢锯斩断“红星杨”时,只锯到一寸深,锯条便断裂;换一条钢锯再锯,又断;举刀朝树干斜砍下去,刀断裂。在这里,“红星杨”寓意深远——中国人民已经铸成了铜墙铁壁,来犯者必将被撞得头破血流。

该书是一部带有玄幻色彩的小说。在大多数人心中,“红星杨”本身就是带有神秘色彩的神树。作品中也充满玄幻元素,开篇由一场风拉开序幕,之后还有不少细节,比如当王小麦被日本人扔下沟的一瞬,家中留贝娘手中的刀突然飞了出去;比如四个孩子,突然出现在杨林沟……更多玄幻是留贝爷爷的一系列举止言行,他一直说“要换天地”,又从史书里搬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整个杨林村上空营造出神秘莫测的氛围。于是,玄幻元素的融入与本就具有玄幻色彩的“红星杨”有了一定的调性。

掩卷思索,这样一个关于“天意”的传奇故事究竟该如何解读,作品深处那

个有价值的“核”便显现出来。作者显然并不想仅仅讲述一个传奇故事,而是以正剧的严肃态度书写那段历史。日寇疯狂屠村、烧树,将入侵者胆怯的心理暴露无遗。日寇惧怕逐渐在民间播散开来的传闻:七棵“红星杨”,北斗七星,天意之兆。这传闻中的天意,其实不就是浩然的民意吗?日寇真正惧怕的,正是浩然的民意。屠村、烧树,就是想压制中国人身上这股精气神。然而,历史证明,正像当年躲进洞里的两个孩子七年身戎装归来,正像“红星杨”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正像乡间的生活又复归原貌一样,它们共同显示了一种强大的、坚韧的生命力量。作品以这样的传奇形式,阐释了天意正是民意的内在关联,达成了另一种对入侵者罪行的控诉与对正义的伸张。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红星杨》的创作初衷就是想告诉孩子们,“红星杨”不仅仅是一棵扎根于沃土的大树,它更代表着一代人的信念、象征着不畏艰难、坚毅勇敢的宝贵精神。

从物象中发掘生活的诗意

——评胡弦散文随笔集《风的嘴唇》

仇士鹏

诗人胡弦的散文随笔集《风的嘴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以他现居地南京为核心,对附近的历史、人物、典故以及自己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生动描写,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作者丰富精神世界和独特的人生观。将过去与现在通过一颗诗心衔接起来,呈现出一幅幅妙趣横生的图景。

全书分为五辑。《鸡鸣寺》《石板街》等游历感怀,诗意、哲理交融;同为游记,《狮子山》《马鞍山》等则重在历史钩沉、触摸古迹,带着思索、探究的意味;《聊斋主人》《大唐三才女》等篇目则简洁轻快,相对自在地漫谈历史和文学人物。

第一辑颇有“烟寒水月笼纱”的意境。作者在石板街,倾听车碾过石板路时的吱吱声,在迷蒙的雾中雾下河下古镇的繁华抑或落寞擦身而过。其中,最核心的便是《古老的事物在风中起伏——徐州汉画像石记》,作者细致地描述画像中的场景:挥舞长袖的歌姬,身姿矫健的击鼓人,人首蛇身缠绕的伏羲女娲,飞腾九天的龙凤,安静吃草的老牛,嘉禾摇曳,大树连理,羽人向着天地而去……他揭示这些场景背后的神话传说、礼仪仪式、饮食文化、制度变迁,以大量文献索引奠定文本基础,以古今中外的比较论述来开拓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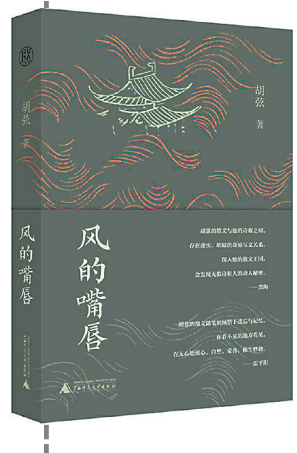
第二辑收录了《聊斋主人》《穆桂英》《孔子与卫国人》《大唐三才女》《柳三变》等文章。作者的笔触简洁明快,富有想象而有节制,对历史和文学人物的解读潇洒自在。他在《聊斋志异》里读出蒲松龄对天下寒窗苦读的学子的慰藉;他赞叹穆桂英的沉稳大气、飒爽英姿,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雄强之美的美丽渐逝;他怀念唐朝才女薛涛、鱼玄机和李冶,她们不拘于“贤内助”的传统角色,以自身才气博得人们的敬重与钦慕,她们勇敢追寻心中所爱,尽管未必总能如愿,却活出了独立潇洒的人生。

第三辑聚焦徐州的山川大地,探索人与物之间的精神联系。比如在作者看来,城市里的山用沉默的姿态“提供着最后的庇护”,为城市凝聚某种不灭的信念;雷平阳曾评价胡弦的散文随笔“倾情于遗忘与记忆,在看不见的地方看见,在无心处触心,自然、妥善、横生妙趣”。他在流逝、珍惜和回望中,用慧心和悲悯织就了寸锦寸金的锦绣文章。

第四辑的主题为乡愁。《美美苗》中,作者介绍了家乡的一种野草。事实上,这是方言中的称呼,和普通话相比带有不同的情致。方言中的植物,显得更加亲近。美美苗的花,远看星星点点,却是祖母发髻上的常客,小小的美美苗此刻又多了一丝情愫。此花匍匐生长,蔓延的身姿好像悠长的生命线,谱写着贴向大地的赞歌。《菜蔬记》是一系列由千字菜蔬散文组合而成的篇章,这些小文徐徐地讲述着父亲、母亲、家里的老人、隔壁的乡邻,还有青豆、韭菜、槐花、南瓜等人与植物的故事。吃食总是牵连着我们的记忆,牵连着我们的胃和心,任岁月悠长,也难忘儿时味道。

第五辑犹如拾遗,从《随手记下》到《打工的人》,记录了作者不期而遇的所见所想。以此收尾,颇为巧妙,把读者重新拉回当下。宏大的历史,突然有了有血有肉细节,那种因穿越时空而产生的虚幻感,在女搬工“迷路的灰尘中忙碌的身影”里悄然消散。

胡弦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之间,存在虚实、明暗的奇异互文关系。深入他的散文王国,会发现无数诗和人的动人秘密。而风的嘴唇,还在源源不断地诉说。



以现实主义笔触为时代画像

——电视剧《大考》观后

李则刚

2020年春节前夕,突如其来的疫情让金和县高三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正当众人克服困厄迎接高考时,一场洪灾又带来了新的挑战……近期热播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大考》,以高考学子、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等共同战胜疫情和洪灾双重考验的故事,传递积极向上、青春洋溢的正能量,彰显全社会在特殊时期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时代精神,是电视剧主题创作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该剧塑造了积极向上、可亲可爱的青年群像。剧中的学生们勇于拼搏,互帮互助,共同经受住了学习和生活中的这场“大考”,展现出朝气蓬勃的青春风采和团结友爱的患难真情。剧中周博文的形象深入人心,模拟考试700多分,每天凌晨五点半开始学习,挤时间夜跑锻炼身体,毫不保留地将学习经验传授给“留守儿童”田雯雯。最让人泪目的是,高考开考前,周博文和父亲冒雨赶往考场的路上,得知没人能联系上田雯雯,想到她住在老城区,排水差,毅然冒着迟到的风险,前去寻找,最终在洪水中将田雯雯背了出来。正如周博文所说,

“有些事情比高考重要”,患难之中的真情得到彰显。

剧中教师对学生全心全意的付出,对教育理念的思考,对培育时代新人重任的价值追求,增加了作品的厚度。两位教育理念迥异的校长,虽在剧中营造了强烈的戏剧冲突,但他们对学生的爱是相同的。史爱华校长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教育公平底线,为学生争取复习时间,给上级写信建议推迟高考,并且为此发动一切力量,体现了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王本中校长整日以校为家,对父母双亡的贫困生高铭宇关怀备至,对厌学的富二代潘小宣呵护有加。潘小宣说连他的富二代父母都做不到这些,问王校长是不是因为自己是潘大龙的儿子才如此照顾自己。王校长回答:“这么做只有一个原因,你是学生,我是老师。”

剧中的一个考生串联起一个个

家庭,群像丰富,人物典型。剧中的吴家俊渴望考上理想的美院,但他的妈妈反对他走艺术道路。临考前母亲终于学会换位思考,意识到孩子的人生是他自己的,最终尊重了孩子的选择。周博文的母亲一直辛苦养家,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给孩子营造一个稳定、和谐、温馨的备考环境。周博文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律和善、不骄不躁,能够平和地面对周围一切变化。

该剧围绕教育展开,提出什么才是好的教育,引发人们的深刻思考。剧中四中和一中两所学校教育水平相近,但史爱华、王本中两位校长有着不同的教育理念。前者倡导“高效优质”,偏重素质教育;后者推崇“苦教苦学”,偏重应试教育。两种教育理念不断碰撞,引导人们进行了深入探讨。教育问题举国关注,我们需要理性地认识,成绩之外,需要考虑学生的多样化需求,教育工作者应该因材施教,促进教育多

